

# 受暴婦女與專業人員對婚姻暴力認知探討研究 四月稿

## 壹、前言

家庭暴力防治法在民國八十七年（一九九八）六月二十四日通過，自此，發生在有親密關係中男女兩人暴力事件不再是屬於家務事，同時，其中第八條也要求各級政府設立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並結合警政、教育、衛生、社政、戶政、司法等相關單位與人員「不得不做」、「不得不管」（高鳳仙，一九九八）；這些防治系統之專業人員即包括法官、檢察官、警察、醫生、教育人員、社服人員等。然而，家庭暴力防治進入法治階段是否足以保障受暴婦女免於暴力呢？來自實務工作者與縣市政府家暴中心的經驗，其答案是否定的（柯麗評，二〇〇〇；周月清，二〇〇〇），癥結之處乃在於我們是先有家庭暴力防治法，即家暴「法」在兩性平權及法入家門「觀念」之前，當事被害人與執法的专业工作者對公權力介入家庭的觀念尚未建立，導致保護令形同虛設、家庭暴力防治官功能不彰、警察偏向息事寧人方式辦案或是採不積極的工作態度或「勸和不勸離」、司法人員傾向責難被害人、教育單位人員也持「法不入

家門」的看法，以及被害人持家醜不可外揚或是以夫為貴的觀念，拒絕或迴避社工人員介入（周月清，二〇〇〇）。究竟這些當事受暴婦女以及執法專業工作者對婚姻暴力的觀念為何呢？是否視婚姻暴力如同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規定為一種犯罪行為或是家務事呢？以及如何回應受暴婦女從被害情境中救出時，但她又回到受暴關係呢？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及比較被害婦女與專業人員對婦女受暴原因、停留受暴關係、及婚姻暴力認知的迷思為何。

## 貳、文獻探討

### 一、社會迷思

婚姻暴力在台灣開始進入法治時代是源自於一九九八年六月，而在西方社會開始視發生在親密關係的暴力為一種社會問題則自一九七〇年代開始（Dobash & Dobash, 1978, 1979, 1981），然而西方學者們也一再認為雖然公權力已經介入防止婚姻暴力的發生，且法令也強制警察要介入逮捕加害人，但社會的價值觀念仍然影響著社會系統（Hampton, Jenkins & Vandergrieff-Avery, 1999；Klingbeil &

Boyd, 1984; Trute, Adkins & MacDonald, 1992), 尤其是第一線制止暴力警察的行爲 (Ferraro, 1989; Black, 1980)。其中也間接影響婦女是否出面尋求協助 (Gordon, 1998; Gelles, 1999; Sherman & Berk, 1984)。誠如 Black (1980) 所言, 社會歷史變遷因素帶來的影響大過於原來計劃中所預期要達成的目標, 譬如當受害人和加害人兩者之間的關係愈近時, 警察的逮捕率愈低。因此西方文獻, 著重在探討來自社會制度面的問題及社會迷思是如何影響專業人員對婚暴認知與回應, 因此間接影響專業人員忽略對求助個案的敏感反應, 甚或責難受害者, 包括還是認為發生在家庭中的暴力是私人事件——「虐待沒那麼嚴重, 要不然她為什麼不離開?」、「她是成人, 她應該會自己選擇」、「她是無助的」、「家庭暴力不是犯罪行爲」、「那是男人愛女人的方式」、「那只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有暴力的家庭總比沒有家庭好」、「她就是太嘮叨了」、「她是暴力的引發者」、「暴力只發生在某些種族、文化背景者身上」、「暴力的受害者與加害者和性別無關」等等 (Dobash & Dobash, 1978, 1979, 1981, 1992a; Lavoie et al., 1989; Fiene, 1995)。

然而學者們也一再強調, 婚姻暴力的發生事實上是社會要負大部分的責任, 是與過去男人為中心的社會有關, 包括在十九世紀以前丈夫以毆打控制妻子是合法行爲, 女人只是男人財產的一部分, 宗教和文化也鼓勵女人要服從她的丈夫 (Dobash &

Dobash, 1978, 1979, 1981; Sampsel, Bernhard, Kerr, Opie, Perley & Pitzer, 1991; Leneman, 1997)。因此呼籲專業人員及社會要從社會與文化因素來看待此問題 (Bograd, 1988; Dutton, 1988, 1992)。因為這種觀念或是上述的迷思已經深植人心, 包括也影響專業人員如何看待婚暴的案件, 且也會反應對求助個案的回應或辦案態度上 (Cannings, 1984)。也就是 Dobash 和 Dobash (1978) 指出社會觀念還是認為女人是「當然受害者」(appropriate victim)；而這些反應與態度也會因著不同專業背景、不同訓練、不同性別而有程度上的差異, 如社服人員的態度會比警察、醫療人員來的敏感 (Klingbeil & Boyd, 1984; Sampsel et al., 1991; Trute et al., 1992; Home, 1994; Cooper & Pennington, 1995; Gordon, 1998)。

事實上發生婚姻暴力的原因與婦女個人因素是無關的, 也不是因為婦女是無助的、婦女離不開受虐關係、婦女不出面求助或是拒絕求助, 事實上與婦女受文化和社會因素影響及社會系統的支持是不夠有關 (Dutton, 1988; McCord, 1992; Buzawa & Austin, 1993; Hampton et al., 1999)。或是受「完整家庭」「模範夫妻」迷思所影響 (Sherman & Berk, 1984; Fiene, 1995)。因此 Gelles 和 Straus (1988)、Walker (1993)、Dobash 和 Dobash (1992b) 呼籲, 不要從受虐婦女的「學習無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 和「受虐婦女症候群」(battered woman syndrome) 來看這些婦女, 應當放棄「責難個

人」及視「婚暴為個人問題」的觀點 (Gelles & Straus, 1988; Walker, 1993; Gelles, 1999; Hester, Pearson & Harwin, 2000)。

國內實證研究中曾針對婦女探討婦女被配偶虐待的原因、受虐婦女的特質以及停留受虐關係原因從事研究 (陳若璋, 一九八八a, 一九八八b, 一九九二a, 一九九二b; 湯秀雅, 一九九三; 周月清, 一九九三; 魏英珠, 一九九五), 但缺乏針對婦女婚暴迷思的回應以及來自專業人員對婚暴認知的探討, 研究焦點比較是放在個人因素大過於社會模式觀點。

## 二、社會系統之回應

在西方社會, 開始立法要求警察和司法系統保護婦女是源起十九世紀 (Dobash & Dobash, 1979), 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前, 警察也視家庭暴力為家務事, 採取被動角色; 但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後, 隨著婦女權利的倡導, 警察開始介入婚姻暴力的工作, 不再視為只是一種家庭危機, 而是一種犯罪行為 (crime), 因此警察的角色是主動的, 並且開始立法要求警察對婚姻關係的加害人有逮捕權 (Schmidt & Sherman, 1993; Bourg & Stock, 1994), 如自一九八三年明尼蘇達州即開始立法要求警察逮捕加害人, 而在一九八七年時, 全美就有一七六個城市執行所謂的逮捕政策來防治婚姻暴力 (Gelles, 1993)。但西方文獻也指出, 整體而言, 警察針對家暴加害

人的逮捕率是低的, 主要原因是相較於加害人是陌生人時, 警察仍視家暴事件非為第一優先介入工作 (Dobash & Dobash, 1979; Bowker, 1982; Sherman & Berk, 1984; Gelles, 1993; Bourg & Stock, 1994), 而且在 Bourg 和 Stock (1994) 的研究中也發現女性加害人的被逮捕率 (八・四%) 比較其預測中女性加害人的比率 (三一五%) 要高, 尤其是女性黑人。表示加害人是女性, 尤其是黑人女性, 比男性加害人更容易被逮捕, 這可能也與警察的態度和其存有的認知迷思有關。

警察是否視婚姻暴力是生活的一部分, 是一種正常現象, 此會影響警察的辦案態度 (Black, 1980; Ferraro, 1989)。Lavoie, Jacob, Hardy 和 Martin (1989) 針對警察是否存有責難受害婦女迷思態度研究中也發現, 警察即使認為加害人是要負責任的, 但其也認為受害的婦女也不能推卸責任; 即警察傾向於將家暴歸因於夫妻的社經地位因素, 或是婦女的口語挑釁; 因此受虐婦女在求助警察過程中, 仍然感受到警察對她們的責難和敵意, 此也呼應 Ferraro (1980) 所指出的, 警察辦案行為除了受法律與政治影響外, 也會受其觀念 (ideology) 的影響。

Schmidt 和 Sherman (1993) 針對「警察逮捕加害人不一定可以制止暴力的再發生」一文中指出, 不能因此否定警察出面制止暴力的意義性, 更重要的是去檢視社會價值觀是如何看待家暴的行為, 警

如社會大眾也不見得都認為家暴是犯罪行為，而這種迷思也會影響警察及司法系統的辦案態度。警察介入婚暴處理加害人的角色主要有三：逮捕、帶開及協調，雖然其中又以逮捕對於降低再犯率最為無效，影響因素包括未來加害人是否遭檢察官起訴與否、是否會受到法官判決等等(Gelles, 1999)。可見，來自司法系統對加害人的同理及對加害人起訴與判刑的控制模式，對制止暴力的再發生是同等重要(Sherman & Berk, 1984; Hamilton et al., 1999)；另外檢察官和法官對婚暴的認知與回應，與警察的辦案態度是相互影響的，其重要性也不容忽略。

根據Buzawa和Buzawa (1996)，檢察官對婚暴案例低的起訴率之相關因素包括：受暴婦女的報案求助動機、加害人是否有犯罪前科及司法系統的組織；如受暴婦女經常對所起訴或控告加害人的行為不能持之以恆，或她又繼續和加害人互動，以及警察未能提供有力證據等，皆會降低檢察官的起訴動作。然而愈是低的起訴率或是判刑率，也會促使婦女愈缺乏對檢法單位的信心(Buzawa & Buzawa, 1996; Gordon, 1998；周月清，一九九三；周月清、高鳳仙，一九九七)，以及也會降低警察對家暴加害人的逮捕率(Sherman & Berk, 1984; Ferraro, 1989)。由此可見，受暴婦女、警察、檢察官、法官、社會對婚暴認知是一個環環相扣、相互影響的關係。

部門。根據Campbell (1991) 所引用的資料指出，美國醫院急診部內的個案中，至少有十%至二二%是因受暴而來求診的婦女，但其中卻只有二%至八%的求診者會被記錄是婚姻暴力的受害者，主要與醫護人員未受過訓練有關(Perley, 1991)。根據另外一個外科部門的預估指出，到急診部門來求診者的婦女中有三〇%是家庭暴力的受暴者(Giuliani & Bratton, 1994)。另根據婦產科醫師的資料，因懷孕而求診的婦女中，有八%是身體受害者；另有十五%之受孕婦女指出，其在懷孕前曾遭受虐待，同時在其他的科別發現的個案也有八%的婦女是受暴者(Campbell, 1991)。

Klingbeil和Boyd(1984)指出社會對受暴婦女的迷思會影響醫療單位的治療哲學；Dyehouse(1991)就醫療系統對婚暴的認知有同樣的陳述——社會一般認為女人比男人較會誇張他們的病痛、受傷害、求助、描述自己的感覺，因此會影響男性醫師淡化或不去注意女性病患在求診中敘述其受害的經驗，只是歸因於女人的心理問題。

國內研究也有同樣發現，受暴婦女對來醫療系統的反應當感受到第二度傷害，包括來自醫療人員的指責、拒絕開驗傷單等等(周月清，一九九三；周月清、高鳳仙，一九九七；黃志中、吳慈恩、張育華、李詩詠，一九九九)。探討其中原因，除了缺乏訓練外，也與性別角色及文化迷思有關(黃志中、吳慈恩，一九九八)。然上述這些針對醫療系統回應的實證研究都是從參與研究的受暴婦女



收集資料，但並非直接從醫療人員去探討其對婚暴的認知或其對受暴婦女的態度，究竟醫療人員自己本身是如何看待婚暴事件發生的原因及其認知的迷思為何，則有必要予以探討。

不同專業系統的专业人員是否對婚暴認知會有所差異呢？在Home (1994) 研究中發現，警察和社工員皆認知婚姻暴力發生的原因大部份是男性的責任，然而警察比社工員較容易傾向責難(blane) 婦女及低社經地位者，及主張短期的介入即可。True, Adkins和MacDonald(1992)針對兒福工作者、社區心理衛生實務工作者及警察從事對兒虐的比較態度研究也發現，兒福工作者認為兒虐是兒童在社區一項嚴重問題，但警察則顯著不那麼認為；另外有關以治療或是懲罰觀點來解決問題時，警察又顯著比另外兩者傾向用懲罰方式，另不同的是性別是態度的主要影響因素，但當控制性別變項在三個團體之間時仍存有差異，即不同專業工作者仍然有顯著差異看法。另有關於警察與司法單位比較起來，受害者會比較傾向於尋找警察的協助，且對警察的協助也認為比司法單位要有幫助(Dull & Wint, 1997; Gordon, 1998)。

警察、司法及醫療系統不僅在法律要求下，且在觀念上也認知到其願意介入的意義性，不再視婚姻暴力事件為家務事，且將是最直接有效的，而這種連合介入觀點也在國外文獻中得到實證研究的支持 (Gamache et al., 1988; Edleson, 1991; Edleson & Tolman, 1992;

Hampton et al., 1999; Hester et al., 2000)。因此如何影響國內相關執法系統與人員重視此一問題，在職訓練是很重要的，一者可以提高警察受案率 (Home, 1994)，以及提高醫護人員對婚暴案例發現率 (Klingbeil & Boyd, 1984; Campbell, 1991; Buzawa & Austin, 1993; Ledray, 1994; Hampton et al., 1999)。目前國內曾針對家暴執法系統，包括社服系統、醫療系統、司法及警察系統已有相關實證研究 (王麗容，一九九五；彭淑華，一九九六；黃富源、葉麗娟，一九九六；黃志中，一九九八；黃志中等，一九九九)或是各系統的處理描述 (高鳳仙，一九九六a、一九九六b、一九九六c、一九九六d、一九九八；黃富源、許福生，一九九五；陳如鸞，一九九五；陳質基，一九九五；蔡元祿，一九九五；陳若璋，一九九五；張尙文，一九九六；黃富源、葉麗娟，一九九六；王秋崗，二〇〇〇；林淑娥，二〇〇〇)，但缺乏以司法系統的檢察官及法官為研究對象，探討其對婚暴事件的回應；國內實證研究或是敘述性文章，也比較著重在系統的整合探討 (王麗容，一九九五；彭淑華，一九九六)，或是前述所謂針對受暴婦女個人特質因素，但尚未針對專業人員對婚暴認知從事第一手資料的調查 (陳若璋，一九九二；湯秀雅，一九九三)。

本研究待答問題有三：

(一) 受暴婦女對其受暴原因、停留受暴關係、及婚姻暴力迷

思的認知為何？

(二) 防制系統之專業人員對受暴婦女受暴原因、停留受暴關係、及婚姻暴力迷思的認知為何？

(三) 比較受暴婦女及專業人員對受暴婦女受暴原因、停留受暴關係、及婚姻暴力迷思的認知之同異性為何？

本研究所指之「婚姻暴力」，則根據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定義(第三條)，指暴力行為發生在法定上現有夫妻或已離婚前配偶之男女關係。暴力行為則指身體上或精神上不法侵害，包括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或製造人心生畏懼情境行為(第二條)。上述「婚姻暴力」中的受暴者，本研究只針對女性部分，因此以「受暴婦女」稱之。「專業人員」則指來自司法、警察、社政、醫療、教育等單位之法官、檢察官、警察、社服人員、教育人員、及醫生等。針對受暴婦女與專業人員的認知有三部分：受暴原因、停留受暴關係、及婚姻迷思等，分別以三份量表測量(詳見研究工具的敘述)。

##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受暴婦女及來自防治系統專業人員對婚暴的認知，以調查研究進行之，以郵寄問卷由受訪者自行填答方式收集資料，郵寄問卷寄發時間為八六(一九九七)年二月至三月。

### 一、研究對象及選擇

本研究對象僅針對台北市的受暴婦女及執法系統(警察系統、法院系統、檢察系統、醫療系統、教育系統及社政系統)之專業人員，分別以立意、普查及系統選擇選取受訪對象。共得有效樣本二四六，回收率介於六八·三%至二八·〇%。選擇架構(sampling frame)及選擇方式敘述如下。

(一) 受暴婦女：以台北市轄區內有提供直接服務的社福單位的求助個案為主，這些社福單位包括社會局北區婦女福利中心、現代婦女基金會、善牧修女會。共得四十一名個案，回收之有效樣本數為二十八名，回收率六八·三%。資料收集方式由上述三個社福單位社工人員代為發放問卷給受訪之受暴婦女。

(二) 警察系統：以台北市十二個行政區內的十四個分局及女警隊作為研究對象選取女警隊女性警察五〇名，分局警察五〇名，共一〇〇名。選擇方法，則請社會局發文給台北市警察局，請其代為發放問卷給受訪警察，回收有效樣本五七份，回收率五七%。

(三) 司法系統：以台北市轄區內之台北與士林地方法院與地檢署的法官和檢察官作為研究對象，共有四個單位。先根據兩地法院法官與檢察官之名冊編號建立樣本架構。共得法官一三七位及檢察官一一八位，以郵寄方式進行普查。回收樣本，法官為三九份，回

收率二八·五%；檢察官二三份，回收率二八·〇%。

(四) 醫療系統：針對台北市十家公私立醫院之一般外科與婦產科醫師進行選樣，此十家醫院分別為台大、中興、陽明、仁愛、和平、郵政、榮總、馬偕、新光及忠孝等；選樣架構乃根據上述各醫院之門診醫師名冊編制，共得醫師二二九名，後以系統抽樣法抽取雙號為受訪對象，共得樣本數一一四名，以郵寄方式連同社會局公文寄發給受訪之醫師。回收有效樣本三三三份，回收率二八·九%。

(五) 社會服務系統：研究對象為台北市轄區內所有提供受暴婦女之十個社福機構的所有社工人員。此十個機構為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北區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婦女保護中心、現代婦女基金會婦女權益申訴中心、基督教芥菜種會、善牧修女會、婦女新知一〇四專線、台北家扶中心、松德婦女保護中心、佛教觀音線協會、台北市婦女會，共得四三名社工人員。回收有效樣本二七份，回收率六二·八%。

(六) 教育系統：針對台北市之公私立國中國小的輔導室進行資料收集。樣本來源乃根據教育部統計處彙編各級學校名錄，共得台北市二一六所國中小學，先予以編號建立樣本架構，後以系統抽樣法，每三號抽取一名，共得七二個樣本，每一個學校寄發一份問卷，回收有效樣本三九份，回收率五四·二%。

##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共設計七份問卷，分別針對受暴婦女、警察系統、司法系統（有兩份含法院系統和檢察系統）、醫療系統、教育系統及社政系統之專業人員。

資料收集分別包括受訪者基本資料（性別、年齡、工作年資、婚姻狀況），是否受過婚暴相關訓練課程，未來是否願意參與相關訓練，生活週遭是否有婚暴案例；另，包括本研究所要探討受訪者對婚暴認知，共有三部分：（1）對婚姻暴力發生因素歸因；（2）受暴婦女為什麼不離開受暴關係的原因；（3）婚暴認知迷思等。

（一）婚姻暴力發生因素歸因——共有九題（詳見表一），分別為：（1）施虐者因素（第2、6題）；（2）受虐者因素（第3、4題）；（3）兩性互動因素（第8題）；（4）社會因素（第1、5、7、9題）。

（二）受暴婦女為什麼不離開的原因，共有十四題（詳見表二）。

（三）婚暴認知迷思，共有十四題（詳見表三），其中第十一、十二、十三題為反向題，以反向計分。受訪者回答愈是同意者（三至〇之尺度測量，三表非常同意，〇表非常不同意）認知迷思愈高。

表一 受訪者認為會發生婚姻暴力的歸因分析表

項 目	受訪者	人 數 (%)				平均數	標準差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 男女不平等	受暴婦女 (N=27)	8 (29.6%)	14 (51.9%)	2 (7.4%)	3 (11.1%)	2.250	0.608
	教育系统 (N=37)	5 (13.5%)	25 (67.6%)	5 (13.5%)	2 (5.4%)	1.892	0.699
	醫療系統 (N=33)	4 (12.1%)	17 (51.5%)	10 (30.3%)	2 (6.1%)	1.697	0.770
	警察單位 (N=57)	9 (15.8%)	31 (54.4%)	17 (29.8%)		1.828	0.704
	法官 (N=39)	6 (15.4%)	28 (71.8%)	5 (12.8%)		2.026	0.537
	檢察官 (N=23)	3 (13.0%)	17 (73.9%)	2 (8.7%)	1 (4.3%)	1.957	0.638
2. 施暴者生長於暴力家庭	社服人員 (N=27)	10 (37.0%)	14 (51.9%)	3 (11.1%)		2.259	0.608
	受暴婦女 (N=28)	5 (17.9%)	13 (46.4%)	6 (21.4%)	4 (14.3%)	1.958	0.690
	教育系统 (N=36)	9 (25.0%)	19 (52.8%)	8 (22.2%)		2.028	0.696
	醫療系統 (N=33)		20 (60.6%)	12 (36.4%)	1 (3.0%)	1.576	0.561
	警察單位 (N=57)	12 (21.1%)	28 (49.1%)	17 (29.8%)		1.879	0.751
	法官 (N=39)	4 (10.3%)	22 (56.4%)	12 (30.8%)	1 (2.6%)	1.744	0.677
3. 受暴者沉默助長施暴者施暴行為	檢察官 (N=23)	6 (26.1%)	13 (56.5%)	4 (17.4%)		2.087	0.668
	社服人員 (N=27)	7 (25.9%)	16 (59.3%)	4 (14.8%)		2.111	0.690
	受暴婦女 (N=27)	7 (25.9%)	11 (40.7%)	5 (18.5%)	4 (14.8%)	2.136	0.710
	教育系统 (N=37)	13 (35.1%)	21 (56.8%)	3 (8.1%)		2.270	0.608
	醫療系統 (N=33)	3 (9.1%)	23 (69.7%)	5 (15.2%)	2 (6.1%)	1.818	0.683
	警察單位 (N=56)	22 (39.3%)	29 (51.8%)	4 (7.1%)	1 (1.8%)	2.246	0.739
4. 施暴者有不良嗜好	法官 (N=39)	7 (17.9%)	26 (66.7%)	5 (12.8%)	1 (2.6%)	2.000	0.649
	檢察官 (N=23)	4 (17.4%)	15 (65.2%)	3 (13.0%)	1 (4.3%)	1.957	0.706
	社服人員 (N=27)	6 (22.2%)	13 (48.1%)	7 (25.9%)	1 (3.7%)	1.889	0.710
	受暴婦女 (N=27)	5 (18.5%)	4 (14.8%)	11 (40.7%)	7 (25.9%)	1.700	0.865
	教育系统 (N=36)	4 (11.1%)	7 (19.4%)	21 (58.4%)	4 (11.1%)	1.306	0.822
	醫療系統 (N=33)	1 (3.0%)	11 (33.3%)	20 (60.6%)	1 (3.0%)	1.364	0.603
5. 公權力不介入家庭	警察單位 (N=56)	4 (7.1%)	19 (33.9%)	31 (55.4%)	2 (3.6%)	1.421	0.706
	法官 (N=38)		8 (21.1%)	25 (65.8%)	5 (13.2%)	1.282	0.587
	檢察官 (N=23)	2 (8.7%)	6 (26.1%)	14 (60.9%)	1 (4.3%)	1.391	0.722
	社服人員 (N=27)		8 (29.6%)	10 (37.0%)	9 (33.3%)	0.963	0.865
	受暴婦女 (N=27)	6 (22.2%)	5 (18.5%)	9 (33.3%)	7 (25.9%)	1.850	0.875
	教育系统 (N=37)	3 (8.1%)	19 (51.4%)	12 (32.4%)	3 (8.1%)	1.595	0.762
6. 施暴者有人格偏差	醫療系統 (N=33)	1 (3.0%)	14 (42.4%)	17 (51.5%)	1 (3.0%)	1.455	0.617
	警察單位 (N=57)	3 (5.3%)	26 (45.6%)	21 (36.8%)	7 (12.3%)	1.414	0.795
	法官 (N=39)	1 (2.6%)	19 (48.7%)	15 (38.5%)	4 (10.3%)	1.436	0.718
	檢察官 (N=23)	1 (4.3%)	8 (34.8%)	13 (56.5%)	1 (4.3%)	1.391	0.656
	社服人員 (N=27)	10 (37.0%)	11 (40.7%)	4 (14.8%)	2 (7.4%)	2.185	0.875
	受暴婦女 (N=27)	13 (48.1%)	10 (37.0%)	1 (3.7%)	3 (11.1%)	2.500	0.590
7. 社會系統不介入，視為家事	教育系统 (N=37)	19 (51.3%)	17 (46.0%)	1 (2.7%)		2.486	0.559
	醫療系統 (N=33)	3 (9.1%)	23 (69.7%)	6 (18.2%)	1 (3.0%)	1.848	0.619
	警察單位 (N=56)	10 (17.9%)	35 (62.5%)	9 (16.1%)	2 (3.6%)	1.912	0.739
	法官 (N=39)	13 (33.3%)	23 (59.0%)	5 (12.8%)	1 (2.6%)	2.231	0.667
	檢察官 (N=23)	7 (30.4%)	15 (65.2%)	1 (4.3%)		2.261	0.739
	社服人員 (N=27)	8 (29.6%)	16 (59.3%)	3 (11.1%)		2.222	0.590
8. 兩性溝通不良	受暴婦女 (N=27)	7 (25.9%)	7 (25.9%)	7 (25.9%)	6 (22.2%)	2.000	0.837
	教育系统 (N=37)	6 (16.2%)	18 (48.6%)	10 (27.0%)	3 (8.1%)	1.730	0.838
	醫療系統 (N=33)		18 (54.5%)	14 (42.4%)	1 (3.0%)	1.515	0.566
	警察單位 (N=55)		3 (5.4%)	18 (32.7%)	6 (10.9%)	1.429	0.710
	法官 (N=39)	3 (7.7%)	25 (64.1%)	8 (20.5%)	3 (7.7%)	1.718	0.724
	檢察官 (N=22)	1 (4.5%)	12 (54.5%)	7 (31.8%)	2 (9.1%)	1.870	0.559
9. 老婆打跑了還可以再娶	社服人員 (N=27)	13 (48.1%)	9 (33.3%)	3 (11.1%)	2 (7.4%)	2.111	0.837
	受暴婦女 (N=26)	10 (38.5%)	11 (42.3%)	2 (7.7%)	3 (11.5%)	2.348	0.647
	教育系统 (N=37)	18 (48.6%)	17 (46.0%)	2 (5.4%)		2.432	0.603
	醫療系統 (N=33)	4 (12.1%)	24 (72.7%)	4 (12.1%)	1 (3.0%)	1.939	0.609
	警察單位 (N=55)	21 (38.1%)	27 (49.1%)	7 (12.7%)		2.214	0.731
	法官 (N=38)	3 (7.9%)	32 (84.2%)	3 (7.9%)		2.179	0.403
10. 老婆打跑了還可以再娶	檢察官 (N=23)	8 (34.8%)	14 (60.9%)	1 (4.3%)		2.304	0.905
	社服人員 (N=27)	9 (33.3%)	13 (48.1%)	4 (14.8%)	1 (3.7%)	1.074	0.647
	受暴婦女 (N=26)	7 (26.9%)	6 (23.1%)	6 (23.1%)	7 (26.9%)	2.053	0.848
	教育系统 (N=37)	1 (2.7%)	10 (27.0%)	16 (43.3%)	10 (27.0%)	1.054	0.815
	醫療系統 (N=33)		7 (21.2%)	20 (60.6%)	6 (18.2%)	1.030	0.637
	警察單位 (N=57)	2 (3.6%)	11 (19.6%)	24 (42.9%)	19 (33.9%)	0.912	0.830
11. 老婆打跑了還可以再娶	法官 (N=39)		11 (28.2%)	18 (46.2%)	10 (25.6%)	1.026	0.743
	檢察官 (N=23)	2 (8.7%)	3 (13.0%)	11 (47.8%)	7 (30.4%)	1.000	0.288
12. 老婆打跑了還可以再娶	社服人員 (N=27)	2 (7.4%)	7 (25.9%)	9 (33.3%)	9 (33.3%)	1.074	0.848



表二 受訪者認為婦女不提出離婚或離不開受暴關係的原因分析表

項目	受訪者	人數(%)			
1. 為了孩子	受暴婦女(N=29)	24(82.8%)	8. 受	受暴婦女(N=29)	5(17.2%)
	教育系統(N=37)	34(91.9%)		教育系統(N=37)	4(10.8%)
	醫療系統(N=33)	1(3.0%)		警察系統(N=33)	7(21.2%)
	警察單位(N=57)	51(89.5%)		警察單位(N=57)	13(22.8%)
	法官(N=39)	38(97.4%)		法官(N=39)	1(2.6%)
	檢察官(N=23)	23(100.0%)		檢察官(N=23)	1(4.3%)
	社服人員(N=27)	24(88.9%)		社服人員(N=27)	1(3.7%)
2. 經濟不能獨立	受暴婦女(N=29)	14(48.3%)	9. 害怕孤獨	受暴婦女(N=29)	2(6.9%)
	教育系統(N=37)	15(40.5%)		教育系統(N=37)	4(10.8%)
	醫療系統(N=33)	21(63.6%)		警察系統(N=33)	1(3.0%)
	警察單位(N=57)	23(40.4%)		警察單位(N=57)	2(3.5%)
	法官(N=39)	29(74.4%)		法官(N=39)	1(7.7%)
	檢察官(N=23)	16(69.6%)		檢察官(N=23)	1(4.3%)
	社服人員(N=27)	16(59.3%)		社服人員(N=27)	3(11.1%)
3. 對施暴者還抱著希望	受暴婦女(N=29)	14(48.3%)	10. 無處可去	受暴婦女(N=29)	
	教育系統(N=37)	21(56.8%)		教育系統(N=37)	3(8.1%)
	醫療系統(N=33)	16(48.5%)		警察系統(N=33)	5(15.2%)
	警察單位(N=57)	35(61.4%)		警察單位(N=57)	9(15.8%)
	法官(N=39)	18(46.2%)		法官(N=39)	8(20.5%)
	檢察官(N=23)	15(65.2%)		檢察官(N=23)	3(13.0%)
	社服人員(N=27)	13(48.1%)		社服人員(N=27)	6(22.2%)
4. 害怕施暴者打得更嚴重	受暴婦女(N=29)	10(34.5%)	11. 已習慣施暴者行為	受暴婦女(N=29)	2(6.9%)
	教育系統(N=37)	9(24.3%)		教育系統(N=37)	1(2.7%)
	醫療系統(N=33)	7(21.2%)		警察系統(N=33)	2(6.1%)
	警察單位(N=57)	10(17.5%)		警察單位(N=57)	
	法官(N=39)	6(15.4%)		法官(N=39)	
	檢察官(N=23)	1(4.3%)		檢察官(N=23)	
	社服人員(N=27)	9(33.3%)		社服人員(N=27)	2(7.4%)
5. 宿命	受暴婦女(N=29)	4(13.8%)	12. 宗教因素	受暴婦女(N=29)	6(20.7%)
	教育系統(N=37)	9(24.3%)		教育系統(N=37)	1(2.7%)
	醫療系統(N=33)	8(24.2%)		警察系統(N=33)	2(6.1%)
	警察單位(N=57)	11(19.3%)		警察單位(N=57)	2(3.5%)
	法官(N=39)	9(23.1%)		法官(N=39)	
	檢察官(N=23)	7(30.4%)		檢察官(N=23)	
	社服人員(N=27)	6(22.2%)		社服人員(N=27)	1(3.7%)
6. 擔心別人將怎麼想	受暴婦女(N=29)	9(31.0%)	13. 婦女有被虐待狂	受暴婦女(N=29)	2(6.9%)
	教育系統(N=37)	8(21.6%)		教育系統(N=37)	
	醫療系統(N=33)	9(27.3%)		警察系統(N=33)	1(3.0%)
	警察單位(N=57)	6(10.5%)		警察單位(N=57)	1(1.8%)
	法官(N=39)	5(12.8%)		法官(N=39)	
	檢察官(N=23)	2(8.7%)		檢察官(N=23)	
	社服人員(N=27)	3(11.1%)		社服人員(N=27)	
7. 無法離婚	受暴婦女(N=29)	11(37.9%)	14. 因性需求而願意忍受	受暴婦女(N=29)	2(6.9%)
	教育系統(N=37)	6(16.2%)		教育系統(N=37)	
	醫療系統(N=33)	5(15.2%)		警察系統(N=33)	
	警察單位(N=57)	6(10.5%)		警察單位(N=57)	
	法官(N=39)	7(17.9%)		法官(N=39)	
	檢察官(N=23)	3(13.0%)		檢察官(N=23)	
	社服人員(N=27)	6(22.2%)		社服人員(N=27)	

表三 受訪者對婚姻暴力事件的看法(婚暴迷思)分析表

項目	受訪者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 夫妻床頭吵床尾和	受暴婦女(N=26)		5(19.2%)	14(53.8%)	7(26.9%)	1.236	0.452	
	教育系統(N=37)	2(5.4%)	12(32.4%)	21(56.8%)	2(5.4%)	1.378	0.681	
	醫療系統(N=33)	4(12.1%)	18(54.5%)	10(30.3%)	1(3.0%)	1.758	0.708	
	警察單位(N=55)	13(23.6%)	30(54.5%)	9(16.4%)	3(5.5%)	1.929	0.828	
	法官(N=39)	4(10.3%)	15(38.5%)	17(43.6%)	3(7.7%)	1.513	0.790	
	檢察官(N=23)	2(8.7%)	11(47.8%)	9(39.1%)	1(4.3%)	1.609	0.722	
	社服人員(N=27)		2(7.4%)	13(48.1%)	12(44.4%)	0.630	0.452	
2. 夫妻吵架只是我們社會中的小事	受暴婦女(N=28)		3(10.7%)	12(42.9%)	13(46.4%)	1.200	0.414	
	教育系統(N=36)		6(16.7%)	26(72.2%)	4(11.1%)	1.056	0.532	
	醫療系統(N=33)	1(3.0%)	19(57.6%)	11(33.3%)	2(6.1%)	1.576	0.633	
	警察單位(N=57)	3(5.3%)	16(28.1%)	32(56.1%)	6(10.5%)	1.259	0.739	
	法官(N=39)	2(5.1%)	14(35.9%)	18(46.2%)	5(12.8%)	1.333	0.772	
	檢察官(N=23)		7(30.4%)	14(60.9%)	2(8.7%)	1.217	0.600	
	社服人員(N=27)		3(11.1%)	12(44.4%)	12(44.4%)	0.667	0.414	
3. 暴力經過一段時間會自然停止	受暴婦女(N=26)			9(34.6%)	17(65.4%)	1.000	0.000	
	教育系統(N=37)		3(8.2%)	17(45.9%)	17(45.9%)	0.622	0.639	
	醫療系統(N=33)	2(6.1%)	1(3.0%)	20(60.6%)	10(30.3%)	0.848	0.755	
	警察單位(N=57)		1(1.8%)	32(56.1%)	24(42.1%)	0.586	0.531	
	法官(N=38)			19(50.0%)	19(50.0%)	0.718	0.507	
	檢察官(N=23)		4(17.4%)	10(43.5%)	9(39.1%)	0.783	0.736	
	社服人員(N=27)			4(14.8%)	23(85.2%)	0.148	0.000	
4. 會打女人的老公才是男人	受暴婦女(N=28)			5(17.9%)	23(82.1%)	1.000	0.000	
	教育系統(N=37)			7(18.9%)	30(81.1%)	0.189	0.397	
	醫療系統(N=33)	1(3.0%)	1(3.0%)	11(33.3%)	20(60.6%)	0.485	0.712	
	警察單位(N=55)			15(27.3%)	40(72.7%)	0.268	0.447	
	法官(N=39)			8(20.5%)	31(79.5%)	0.205	0.409	
	檢察官(N=23)			6(26.1%)	17(73.9%)	0.261	0.449	
	社服人員(N=27)			3(11.1%)	24(88.9%)	0.111	0.000	
5. 夫妻之間的事，局外人不要管	受暴婦女(N=26)		2(7.7%)	12(46.2%)	12(46.2%)	1.143	0.363	
	教育系統(N=37)		9(24.3%)	17(46.0%)	11(29.7%)	0.946	0.743	
	醫療系統(N=32)	1(3.1%)	10(31.3%)	17(53.1%)	4(12.5%)	1.250	0.718	
	警察單位(N=57)	2(3.5%)	21(36.8%)	24(42.1%)	10(17.5%)	1.241	0.802	
	法官(N=38)	1(2.6%)	4(10.5%)	24(63.2%)	9(23.7%)	1.128	0.673	
	檢察官(N=23)	1(4.3%)	5(21.7%)	14(60.9%)	3(13.0%)	1.174	0.717	
	社服人員(N=26)			9(34.6%)	17(65.4%)	0.346	0.363	
6. 只有沒有知識的人會打老婆	受暴婦女(N=26)	6(23.1%)	2(7.7%)	10(38.5%)	8(30.8%)	1.778	0.943	
	教育系統(N=37)	2(5.4%)	5(13.5%)	9(24.3%)	21(56.8%)	0.676	0.915	
	醫療系統(N=33)	1(3.0%)	3(9.1%)	23(69.7%)	6(18.2%)	1.182	0.637	
	警察單位(N=55)	14(25.5%)	10(18.1%)	15(27.3%)	16(29.1%)	1.375	1.169	
	法官(N=39)	4(10.3%)		1(5.3.8%)	14(35.9%)	0.846	0.875	
	檢察官(N=22)	5(22.7%)	2(9.1%)	10(45.5%)	5(22.7%)	1.652	1.086	
	社服人員(N=27)	1(3.7%)		3(11.1%)	23(85.2%)	0.222	0.943	
7. 家醜不要外揚	受暴婦女(N=27)		7(25.9%)	10(37.0%)	10(37.0%)	1.412	0.507	
	教育系統(N=36)		4(11.1%)	20(55.6%)	12(33.3%)	0.778	0.637	
	醫療系統(N=32)	2(6.3%)	13(40.6%)	15(46.9%)	2(6.3%)	1.469	0.718	
	警察單位(N=57)	1(1.8%)	25(43.9%)	22(38.6%)	9(15.8%)	1.293	0.773	
	法官(N=39)		12(30.8%)	17(43.6%)	10(25.6%)	1.051	0.759	
	檢察官(N=23)	2(8.7%)	8(34.8%)	11(47.8%)	2(8.7%)	1.435	0.788	
	社服人員(N=27)	1(3.7%)		8(29.6%)	18(66.7%)	0.407	0.507	

8. 男人會打他的配偶，只是一時衝動	受暴婦女 (N=27)	1 (3.7%)		11 (40.7%)	15 (55.6%)	1.167	0.577
	教育系統 (N=36)	1 (2.8%)	3 (8.3%)	19 (52.8%)	13 (36.1%)	0.778	0.722
	醫療系統 (N=33)	1 (3.0%)	7 (21.2%)	22 (66.7%)	3 (9.1%)	1.182	0.635
	警察單位 (N=56)	1 (1.8%)	11 (19.6%)	32 (57.1%)	12 (21.4%)	1.000	0.707
	法官 (N=38)		4 (10.5%)	25 (65.8%)	9 (23.7%)	1.077	0.578
	檢察官 (N=23)		8 (34.8%)	10 (43.5%)	5 (21.7%)	1.130	0.757
9. 婚姻暴力只會發生在少數婦女身上	社服人員 (N=27)		1 (3.7%)	9 (33.3%)	17 (63.0%)	0.407	0.577
	受暴婦女 (N=26)	1 (3.8%)	3 (11.5%)	16 (61.5%)	6 (23.1%)	1.250	0.550
	教育系統 (N=37)		14 (37.9%)	15 (40.5%)	8 (21.6%)	1.162	0.764
	醫療系統 (N=33)		14 (42.4%)	15 (45.5%)	4 (12.1%)	1.303	0.684
	警察單位 (N=55)	13 (23.6%)	30 (54.5%)	9 (16.4%)	3 (5.5%)	1.296	0.861
	法官 (N=38)		16 (42.1%)	18 (42.1%)	6 (15.8%)	1.462	0.724
10. 婚姻暴力只發生在下層社會	檢察官 (N=23)		10 (43.5%)	10 (43.5%)	3 (13.0%)	1.304	0.703
	社服人員 (N=27)		1 (3.7%)	8 (29.6%)	18 (66.7%)	0.370	0.550
	受暴婦女 (N=26)		1 (3.8%)	17 (65.4%)	8 (30.8%)	1.056	0.236
	教育系統 (N=37)	1 (2.7%)	2 (5.4%)	19 (51.4%)	15 (40.5%)	0.703	0.702
	醫療系統 (N=33)		2 (6.1%)	22 (66.7%)	9 (27.3%)	0.788	0.461
	警察單位 (N=56)	1 (1.8%)	4 (7.1%)	30 (53.6%)	21 (37.5%)	0.719	0.675
11. 男生或女生都沒有使用暴力的權利 (反向題)	法官 (N=39)		1 (2.6%)	23 (59.0%)	15 (38.5%)	0.641	0.537
	檢察官 (N=22)		1 (4.5%)	17 (77.3%)	4 (18.2%)	1.217	0.468
	社服人員 (N=27)			5 (18.5%)	22 (81.5%)	0.185	0.236
	受暴婦女 (N=27)	2 (7.4%)		9 (33.3%)	16 (59.3%)	1.200	0.632
	教育系統 (N=37)	2 (5.4%)	1 (2.7%)	9 (24.3%)	25 (67.6%)	0.459	0.803
	醫療系統 (N=33)	1 (3.0%)	3 (9.1%)	15 (45.5%)	14 (42.4%)	0.727	0.761
12. 無論如何，只要打人就是犯罪行為 (反向題)	警察單位 (N=56)	1 (1.8%)	3 (5.4%)	19 (33.9%)	33 (58.9%)	0.544	0.758
	法官 (N=39)	1 (2.6%)	2 (5.1%)	10 (25.6%)	26 (66.7%)	0.436	0.718
	檢察官 (N=23)			3 (13.0%)	20 (87.0%)	0.130	0.344
	社服人員 (N=27)		1 (3.7%)	4 (14.8%)	22 (81.5%)	0.222	0.632
	受暴婦女 (N=27)	3 (11.1%)		9 (33.3%)	15 (55.6%)	1.364	0.809
	教育系統 (N=3)	1 (2.7%)	2 (5.6%)	20 (55.6%)	13 (36.1%)	0.750	0.692
13. 婚姻暴力原本就存在我們的社會 (反向題)	醫療系統 (N=33)	1 (3.0%)	7 (21.2%)	20 (60.6%)	5 (15.2%)	1.121	0.696
	警察單位 (N=57)	1 (1.8%)	6 (10.5%)	25 (43.9%)	25 (43.9%)	0.471	0.711
	法官 (N=39)	4 (10.3%)	9 (23.1%)	15 (38.5%)	11 (28.2%)	1.154	0.961
	檢察官 (N=23)		4 (17.4%)	6 (26.1%)	13 (56.5%)	0.609	0.783
	社服人員 (N=27)		3 (11.1%)	8 (29.6%)	16 (59.3%)	0.519	0.809
	受暴婦女 (N=26)	5 (19.2%)	5 (19.2%)	11 (42.3%)	5 (19.2%)	2.000	0.707
14. 小孩雖然有個會打母親的父親，但總比沒有好	教育系統 (N=35)		4 (11.4%)	23 (65.7%)	8 (22.9%)	2.114	0.583
	醫療系統 (N=33)	1 (3.0%)	3 (9.1%)	21 (63.6%)	8 (24.2%)	2.091	0.678
	警察單位 (N=57)	1 (1.8%)	7 (12.3%)	35 (61.4%)	14 (24.6%)	2.052	0.667
	法官 (N=39)	1 (2.6%)	6 (15.4%)	23 (59.0%)	9 (23.1%)	0.974	0.707
	檢察官 (N=22)	1 (4.5%)	1 (4.5%)	14 (63.6%)	6 (27.3%)	1.217	0.710
	社服人員 (N=27)	18 (66.7%)	7 (25.9%)	1 (3.7%)	1 (3.7%)	2.556	0.707
總分	受暴婦女 (N=28)		1 (3.6%)	10 (35.7%)	17 (60.7%)	1.091	0.302
	教育系統 (N=37)		3 (8.1%)	23 (62.2%)	11 (29.7%)	0.784	0.584
	醫療系統 (N=33)		4 (12.5%)	25 (78.1%)	3 (9.4%)	1.031	0.474
	警察單位 (N=57)		6 (10.5%)	25 (43.9%)	26 (45.6%)	0.638	0.739
	法官 (N=39)	1 (2.6%)	6 (15.4%)	23 (59.0%)	9 (23.1%)	0.769	0.667
	檢察官 (N=22)		5 (22.7%)	15 (68.2%)	2 (8.7%)	1.478	0.560
	社服人員 (N=27)		2 (7.4%)	4 (14.8%)	21 (77.8%)	0.296	0.302
總分	受暴婦女			$\bar{x}=1.278$ ; 組距=1.000-2.000			
	教育系統			$\bar{x}=.885$ ; 組距=.189-2.114			
	醫療系統			$\bar{x}=1.201$ ; 組距=.485-2.091			
	警察單位			$\bar{x}=1.067$ ; 組距=.268-2.052			
	法官			$\bar{x}=.9505$ ; 組距=.1513-0.205			
	檢察官			$\bar{x}=1.086$ ; 組距=.1652-0.130			
	社服人員			$\bar{x}=.506$ ; 組距=.2556-0.111			

註：3 表非常同意，2 表同意，1 表不同意，0 表非常同意；反向題反向計分

## 肆、研究發現

###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 (一) 基本資料

##### 1 受暴婦女基本資料

受訪之受暴婦女共有二十八名，其年齡層在二十五歲至四十九歲之間，最多為三十五歲至三十九歲（三五·七%，其施暴男人的年齡在三〇~五〇歲以上，最多為四〇~四四歲（四〇·七%）；受虐者之教育程度以國中佔最多（三九·一%），施虐者教育程度以高中職、五專佔最多（五一·九%）；受虐者職業以家管最多（二三·一%），施虐者的職業則以技工（二〇·七%）、工人（一〇·七%）、專技人員（一〇·七%）最多；受虐者與施虐者關係以已婚同居佔最多（五三·六%），次為已婚分居（二八·六%），及離婚分居者（一〇·七%）；家庭結構以小家庭最多（六五·四%），大家庭次之（二三·一%）；家庭每月總收入以在二至四萬元之間最多（三八·九%）。受暴婦女生活周遭是否有婚姻暴力個案，回答有者佔七六·〇%，其中，其父母有婚姻暴力情形者佔回答有者之三十一·六%。

##### 2 國中、小學輔導老師基本資料

三十九個學校之受訪輔導老師中，主修專業以「其他」佔最多（二八·二%），次為輔導系（一七·九%）；最高學歷以學士佔最多（六九·二%），次為碩士（一七·九%）；性別以女性居多

（六六·七%），男性較少（三三·三%）；年資以十年以上最多，年齡集中在三〇至六〇歲之間，最多為四一至五〇歲佔五一·四%，次為三〇至四〇歲（三二·四%）。受訪老師中有受過婚暴相關職訓或座談者佔一一·四%，沒有者佔八八·六%；其中願意參與婚暴訓練或座談者佔七五·〇%，不願意者佔二五%；生活周遭有婚暴案例者佔六八·四%，婚暴當事人最多為其親戚（二三·七%），其中婚暴當事人是父母者佔七·九%，而自己者佔二·六%。受訪老師的婚姻狀況，以已婚佔最多（八九·七%），其它未婚、離婚、分居、配偶死亡各佔二·六%。

##### 3 一般外科、婦產科醫師基本資料

三十三名受訪醫生的服務科別，以婦產科佔最多（五七·六%），次為外科（三六·四%），急診與「其他」最少，分別佔三·〇%；其工作職稱，住院醫師佔最多（四〇·六%），次為主治醫師（三一·三%）。受訪醫生的性別，以男醫生居多（九三·九%），女醫生很少只佔六·一%；年齡以三〇至四〇歲最多（五一·五%），次為四一至五〇歲（二四·二%）；工作年資以一〇年以上最多（四二·四%），次為三至五年（二七·三%）。受訪醫生中有受過婚暴課程或相關訓練者只佔九·一%；其中未來願意接受相關訓練與座談者也只佔二九·〇%。受訪醫生中其生活周遭有婚暴案例者佔四二·四%；婚暴當事人大部分為親戚（二二·一%）；其婚姻狀況大部分為已婚（八四·八%）。



#### 4 警察人員基本資料

受訪之五十七名警察其工作職稱以警員或隊員最多(七〇・二%)，次為派出所主管(一九・三%)；主修專業以行政佔最多(七八・六%)，次為刑事(一四・三%)；最高學歷以專科最多(八二・四%)，次為學士(一五・七%)，碩士以上佔二・〇%；年資以一〇年以上佔最多(五九・六%)，次為六一〇年(二一・一%)；性別以男性居多(六六・七%)，女性較少(三三・三%)；年齡則以三〇至四〇歲最多(四二・一%)，次為四一至五〇歲(二二・八%)；未曾受過相關訓練者佔多數(七三・七%)，有受過訓練者少(二六・三%)；未來願意參與職訓或座談者只佔三九・二%，不願意者佔六〇・八%；生活周遭是否有婚暴案例，回答沒有者佔五五・四%，回答有者佔四四・六%，其中發生婚暴當事者為其鄰居佔最多(五二・〇%)，次為朋友(四〇・〇%)及親戚(三六・〇%)；其婚姻狀況以已婚者佔75.0%。

#### 5 法官基本資料

三十九名受訪法官中，男性佔五一・三%，女性四八・七%；年齡層以三〇至四〇歲最多(五三・八%)，次為四一至五〇歲(二〇・五%)；年資以一〇年以上佔最多(三五・九%)，次為六至一〇年(三三・三%)；其中有受過婚暴相關課程訓練者只有一名(二・六%)，另九七・四%皆回答沒有；有關未來是否願意參與相關訓練或座談，回答願意者佔五五・六%，不願意者佔四四・四%；生活周遭是否有婚暴案例回答有者佔六四・一%，沒有三

五・九%，而婚暴當事人，則以親戚佔最多(佔回答有者之五二・〇%)，次為鄰居(二八・〇%)；其婚姻狀況，已婚者佔七一・一%。

#### 6 檢察官基本資料

受訪之二十三名檢察官，男性佔六九・六%，女性三〇・四%；年齡層以三〇至四〇歲最多(六〇・九%)，次為四一至五〇歲(三〇・四%)；年資以六年至十年最多(三四・八%)，次為十年以上(三〇・四%)；其是否受過婚暴相關課程訓練，回答有者佔四・三%，沒有佔九五・七%；未來是否願意參與相關職訓或座談，回答願意者佔四七・八%，不願意者佔五二・二%；其生活周遭是否有婚暴案例回答有者佔四三・五%，回答沒有者佔五六・五%，而婚暴當事者以其親戚和鄰居佔最多(佔回答有者之四〇・〇%)，次為朋友(二〇・〇%)；其婚姻狀況以已婚者佔八七・〇%。

#### 7 社服人員基本資料

二十七名受訪之社服員，工作職稱以社工員最多(七〇・四%)，次為社工督導員(一一・一%)；年資以三年以下最多(五九・三%)，次為六至十年(二二・二%)；主修專業以社工系最多(六六・七%)，其它為心理系(一一・一%)；最高學歷以學士最多(五五・六%)，次為碩士(二二・二%)；性別以女性居多(八五・二%)，男性較少(一四・八%)；年齡以二五至三〇歲最多(四八・一%)，次為三〇至四〇歲(三七・〇%)；其會

接受過婚暴相關課程與訓練者佔七〇・四％；全部受訪者（二〇〇％）皆回答未來願意接受在職訓練與座談。受訪社服人員中周遭有婚暴案例者佔八〇・八％，婚暴當事人以其朋友或親戚最多（各佔三四・六％）；其婚姻狀況未婚者（五一・九％）多過於已婚者（四四・四％）。

#### （二）受訪各專業系統之工作者基本資料比較分析

##### 1 各專業人員性別、年齡、年資、婚暴案例、婚姻狀況比較探討

根據前述分析各專業人員基本資料而加以比較，發現不同專業人員其性別差異極大，譬如醫療有九三・九％為男性，但社服人員有八五・二％為女性，除了社服與教育人員女性居多之外，其餘皆為男性居多數；毫無疑問，原本醫、警、法、檢等工作就是男性居多，但問卷中間及有關受暴婦女向專業系統求助時，受暴婦女卻期待介入之專業人員是女性優先於男性，包括女性警察、檢察官、法官與女醫師。

另各專業人員當中，其年齡層之比較，大部分為三〇至四〇歲之間（醫、警、法、檢），較為年長者為教育人員（四〇至五〇歲），最為年輕者為社服人員（二五至三〇歲）；但這很難表示介入婚暴個案的處理為三〇至四〇歲之間，只能推論參與此次願意接受訪問者似乎以此年齡層較多，這是否表示此年齡層之專業人員對婚暴事件較為關心呢？乃值得進一步探討。

另，工作年資則大部分（教、醫、警、法）以十年以上及已婚

者居多（教、醫、警、法、檢），而檢察人員與社服人員的年資較淺；有關其生活周遭是否有婚暴案例，其中以社服人員回答最高（八〇・八％），次為教育人員（六八・四％）與法官（六四・一％），最低者為醫生（四二・四％）和檢察官（四三・五％）。而在前面文獻中曾提及，專業人員若有受過婚暴訓練，則其對婚暴案例會較為敏感察覺（Klingbeil & Boyd, 1984; Campbell, 1991; Buzawa & Austin, 1993; Ledray, 1994; Hampton et al., 1999）。因此比較表四和表五，國內之專業人員有受過婚暴專業訓練會較易察覺婚暴案例，而且不同專業人員的養成也會影響此敏感度的差異。

##### 2 各專業工作者曾接受家暴相關訓練及未來參與在職訓練意願之比較探討

根據前述之各受訪專業人員之基本資料，發現受訪人員中有受過相關課程者有四十三人（但不一定直接與婚暴相關課程），佔所有受訪者一九・三％。其中以社服人員受訓的比率最多（七〇・四％），次為警察人員（二六・三％）。受訓比率低於一〇・〇％者為法官（二・六％）、檢察官（二・六％）、醫生（九・一％）（詳見表五）。根據受訪人員之前述基本資料，發現其是否願意參加有關婚姻暴力在職訓練或座談，回答「願意」者有一一四人，佔所有受訪之五一・一％，其中以社服人員意願最高，達一〇〇％，其它依序為教育單位人員（七五・〇％）、法官（五五・六％）、檢察官（四七・八％）、警察（三九・二％），意願最低為醫生（二九・〇％）（詳見表五）。

表四 受訪之各專業人員性別、年齡、婚暴案例、婚姻狀況比較表

佔其受訪之比率		教育	醫療	警察	法官	檢察官	社服人員
性別	男	33.3%	93.9%	66.7%	51.3%	69.6%	14.8%
	女	66.7%	6.1	33.3%	48.7%	30.4%	85.2%
年齡層	最多者	41至50歲 (51.4%)	30至40歲 (51.5%)	30至40歲 (42.1%)	30至40歲 (53.8%)	30至40歲 (60.9%)	25至30歲 (48.1%)
工作年資	最多者	10年以上 (97.3%)	10年以上 (42.4%)	10年以上 (59.6%)	10年以上 (35.9%)	6至10年 (34.8%)	3年以下 (59.3%)
生活週遭 婚暴案例	有	68.4%	42.4%	55.4%	64.1%	43.5%	80.8%
婚姻狀況	已婚者	89.7%	84.8%	75.0%	71.1%	80.7%	44.4%
	未婚	2.6%	15.2%	21.4%	23.7%	13.0%	51.9%

表五 受訪之各系統專業人員受過婚暴訓練或未來意願接受在職訓練比較表

系統	受訪人員 (有效樣本)	有受過相關訓練課程回答人員	未來願意參與在職訓練者
1. 教育	39	4 (11.4%)	27 (75.0%)
2. 醫療	33	3 (9.1%)	9 (29.0%)
3. 警察	57	15 (26.3%)	20 (39.2%)
4. 法官	39	1 (2.6%)	20 (55.6%)
5. 檢察官	23	1 (4.3%)	11 (47.8%)
6. 社服人員	27	19 (70.4%)	27 (100%)
總受訪人員	223	43 (19.3%)	114 (51.1%)

## 二、婚暴發生之歸因（詳見表一）

### （一）受暴婦女

針對受暴婦女對會發生婚姻暴力的認知因素的探討，分析發現：

1 個人因素歸因：（1）施虐者個人因素之二題（2、6）總平均分數為二·二二九，表受訪者同意是施虐者的原因導致婚暴；（2）受虐者個人因素（第3、4題）平均為1.918，表示同意受虐者的因素導致婚暴。

2 兩性互動關係歸因：第8題平均分數為二·三四八，表受訪者也同意兩性互動因素導致婚暴事件。

3 社會因素歸因：第1、5、7、9四題的總平均分數為二·〇三八，表示受訪者同意社會因素也會導致婚暴發生。

綜合上述三種因素，受訪者歸因於兩性互動關係導致婚暴的分數最高，其次分別為施虐者個人因素、社會因素、受虐者因素。但若以單題分析，則發現認為施虐者有人格偏差分數最高（ $\bar{x}=2.25$ ），次為兩性溝通不良（ $\bar{x}=2.35$ ），其次為男女平等因素（ $\bar{x}=2.25$ ）。

### （二）教育系統

針對教育系統受訪者對發生婚姻暴力因素的探討，分析發現：

1 個人因素歸因：（1）施虐者因素之二題（2、6）平均數為二·二五七，表其接近於「同意」；（2）受虐者因素（3、4）之平均為一·七八八，表其同意是受虐者因素造成婚暴的發生。

2 兩性互動關係歸因：第8題分數平均為二·四三二，表其「同意」婚暴是兩性溝通不良導致。

3 社會因素歸因：第1、5、7、9題之平均分數為一·五七，表其對於婚暴發生歸因為社會因素介於「同意」與「不同意」之間。

受訪教育工作者歸因於兩性溝通不良導致婚暴的分數最高，次為施虐者因素；其較不同意者是社會因素促成。當以單題分析，則發現其歸因於「施虐者有人格偏差」分數最高（ $\bar{x}=2.486$ ），次為兩性溝通不良（ $\bar{x}=2.432$ ），其次為「受虐者沈默助長施虐行為」（ $\bar{x}=2.270$ ），及「施虐者生長施暴力家庭」（ $\bar{x}=2.208$ ）。

### （三）醫療系統

針對醫療系統受訪者對發生婚姻暴力因素的探討，分析發現：

1 個人因素歸因：（1）施虐者因素之二題平均分數為一·七一二，表其介於「同意」與「不同意」之間；（2）受虐者因素之平均分數為一·五九一，表也是介於「同意」與「不同意」之間。



2 兩性互動關係歸因：第8題分數平均為一·九三九；表其接近「同意」是兩性溝通導致婚暴。

3 社會因素歸因：第1、5、7、9題之平均分數為一·四二四，表其介於「同意」與「不同意」之間。

綜合上述之三種因素，以兩性溝通不良的平均分數最高，故其將婚暴歸因於兩性互動關係最多，次歸因於施虐者因素。而以單題分析發現，其將婚暴歸因於兩性溝通不良最高（ $\bar{x}=1.939$ ），次為施虐者有人格偏差（ $\bar{x}=1.848$ ）及受虐者沈默助長施虐行為（ $\bar{x}=1.818$ ）。

#### （四）警察系統

針對受訪警察對發生婚姻暴力因素之探討，分析發現：

1 個人因素歸因：（1）施虐者因素之二題平均分數為一·八九六，表其介於「同意」和「不同意」之間；（2）受虐者平均分數為一·八三四，表其「同意」是受虐者沈默助長施虐行為。

2 兩性互動關係歸因：第8題平均分數為一·二一四；表其「同意」是兩性溝通不良導致婚暴。

3 社會因素歸因：第1、5、7、9題之平均分數為一·四〇，表其介於「同意」和「不同意」之間。

綜合上述之三種因素，受訪者主要歸因於兩性溝通不良，次為施虐者因素，其次才為受虐者因素，最後才為社會因素。而以單題

分析，最大歸因亦為第3題（ $\bar{x}=2.246$ ），歸因於受虐者沈默助長施虐行為；歸因最低分數則為第9題，即略為不同意老婆打跑可以再娶（ $\bar{x}=0.912$ ）。

#### （五）司法系統

##### 1 法官

針對受訪法官對發生婚姻暴力因素之探討，分析發現：

（1）個人因素歸因：①施虐者因素之二題平均分數為一·九八八，表其介於「同意」與「不同意」之間；②受虐者因素平均為一·六四一，表其同意受虐者沈默助長施虐行為。

（2）兩性互動關係歸因：第8題平均分數為二·一七九，表其「同意」婚暴是兩性溝通問題產生。

（3）社會因素歸因：第1、5、7、9題平均分數為一·五五，介於「同意」與「不同意」之間。

綜合上述三種因素，歸因分數最高為兩性溝通（ $\bar{x}=2.179$ ），次為施虐者因素（ $\bar{x}=1.988$ ），其次為受虐者因素（ $\bar{x}=1.641$ ），與社會因素（ $\bar{x}=1.55$ ）。以單題分析歸因，則以第6題「施虐者有人格偏差」最高（ $\bar{x}=2.231$ ），次為兩性溝通（ $\bar{x}=2.179$ ），男女不平等（ $\bar{x}=2.206$ ），及受虐者沈默導致婚暴發生（ $\bar{x}=2.000$ ）。

##### 2 檢察官

針對受訪檢察官對發生婚姻暴力因素之探討，分析發現：

(1) 個人因素歸因：① 施虐者因素之平均分數為二·一五二，近於「同意」；② 受虐者因素平均分數為一·六七四，也近於「同意」。

(2) 兩性互動關係歸因：第8題之平均分數為二·三〇四，表其「同意」，婚暴是歸因於兩性之互動關係。

3 社會因素歸因：第1、5、7、9題之平均分數為一·五五五，表介於「同意」與「不同意」之間。

綜合上述三種因素之分析，最高歸因平均分數為兩性互動因素，次為施虐者因素，其次為受虐者；若以單題分析，歸因平均分數最高為兩性溝通不良 ( $\bar{x}=2.304$ )，次為施虐者有人格偏差 ( $\bar{x}=2.261$ ) 與施虐者生長於暴力家庭 ( $\bar{x}=2.087$ )。

#### (六) 社福系統

針對受訪社服工作者對發生婚姻暴力因素之探討，分析發現：

(1) 個人因素歸因：① 施虐者因素之二題平均分數為二·一六七，表介於「同意」與「不同意」之間；② 受虐者因素之分數為一·四二六，表介於「同意」與「不同意」之間。

(2) 兩性互動關係歸因：第8題平均分數為一·〇七四，表介於「同意」與「不同意」之間。

(3) 社會因素歸因：第1、5、7、9題之平均分數為一·

九〇七，表接近「同意」。

綜合上述三種因素分析，發現歸因分數最高為施虐者因素 ( $\bar{x}=2.167$ )，次為社會因素 ( $\bar{x}=1.907$ )，其次為受虐者因素 ( $\bar{x}=1.426$ )，最後為兩性互動因素 ( $\bar{x}=1.074$ )；若以單題分析，則發現歸因分數最高為第13題「男女不平等」( $\bar{x}=2.259$ )，次為「施虐者有人格偏差」( $\bar{x}=2.222$ )，「公權力不介入家庭」( $\bar{x}=2.185$ )，「施虐者生長於暴力家庭」( $\bar{x}=2.111$ ) 與「社會系統不介入，視為家務事」( $\bar{x}=2.111$ )。

#### 二、為什麼受暴婦女不離開受虐關係？（詳見表二）

受訪婦女指出不離婚及不離開受虐關係的原因中，次序分別為：(1) 為了孩子 (八二·八%)，(2) 經濟不能獨立 (四八·三%)，對施虐者還抱著希望 (四八·三%)，(3) 無法離婚者 (三七·九%)，(4) 害怕被施虐者打得更嚴重 (三四·五%)，(5) 擔心別人將怎麼想 (三一·〇%)，(6) 無處可去 (二七·六%)，(7) 宗教因素 (二〇·七%)，(8) 愛 (一七·二%)，(9) 宿命 (一三·八%) 等等。

教育系統受訪者對受暴婦女未離開受虐關係，近92%回答是爲了孩子，其次有五七%認爲是受虐者對施虐者仍存有希望，有11%認爲是婦女經濟不能獨立；其中沒有受訪者認爲婦女有被虐待狂，

或是因爲性需求而停留受虐關係。

醫療系統受訪者對受暴婦女未離開受虐關係，近90%回答是爲了孩子，其次有五七%認爲是受虐者對施虐者仍存有希望，有41%認爲是婦女經濟不能獨立；其中沒有受訪者認爲婦女有被虐待狂，或是因爲性需求而停留受虐關係。

受訪警察對受暴婦女未離開受虐關係之歸因，有八九·五%回答是爲了孩子，其次有六一·四%認爲是對施虐者還抱著希望，有四〇·四%認爲是經濟不獨立，其中沒有受訪者認爲停留受虐關係是因性需求而願意忍受，或是已習慣施虐者的行爲。

受訪法官對受暴婦女未離開受虐關係之歸因，有九七·四%回答是爲了孩子，其次有七四·四%認爲是經濟不獨立，有四六·二%認爲是對施虐者還抱著希望，其中沒有受訪者認爲停留受虐關係是因爲婦女有被虐待狂、宗教因素、因性需求而願意忍受，或是已習慣施虐者的行爲。

受訪檢察官對受暴婦女未離開受虐關係之歸因，有一〇〇%回答是爲了孩子，其次有六九·六%認爲是經濟不獨立，有六五·二%認爲是對施虐者還抱著希望，其中沒有受訪者認爲停留受虐關係是因爲婦女有被虐待狂、宗教因素、因性需求而願意忍受，或是已習慣施虐者的行爲。

社服系統受訪者對受暴婦女未離開受虐關係，八八·九%回答是爲了孩子，其次有近六〇%認爲是婦女經濟不能獨立，有四八%

認爲是受虐者對施虐者仍存有希望；其中沒有受訪者認爲婦女有被虐待狂，或是因爲性需求而停留受虐關係。

#### 四、婚暴迷思（詳見表二）

調查發現受暴婦女其迷思平均分數最高者爲第13題（ $\bar{x}=2.0$ ），次爲第6題「只有沒有知識的人才會打老婆」（ $\bar{x}=1.78$ ），只有第13題平均爲二，表同意這種說法，即受訪婦女不認爲「婚姻暴力原本就存在我們的社會」；其婚暴迷思分數總平均爲一·二八，故表受訪婦女對婚暴事件的迷思認知介於不同意與同意之間。

受訪之教師其迷思平均分最高爲第13題（ $\bar{x}=2.14$ ），即教育工作者不認爲「婚暴原本存在我們的社會」，最沒有迷思的是第4題，即其不認爲「會打女人的老公才是男人」（ $\bar{x}=1.89$ ），其總平均分數爲〇·八八五，表示教育單位工作者，對婚暴迷思之分數近於不同意。

醫生迷思平均最高分爲第13題（ $\bar{x}=2.091$ ），即受訪醫生不認爲「婚暴原本就存在我們的社會」；迷思分數最低的是第4題（ $\bar{x}=4.85$ ），即其「不同意」「會打女人的老公才是男人」；其總平均爲一·二〇一，表示受訪醫生對婚暴的迷思介於「同意」與「不同意」之間。

警察迷思平均分數最高者爲第13題（ $\bar{x}=2.052$ ），表受訪警察不

認為「婚暴原本就存在我們的社會」；其平均分數最低者為第4題（ $\bar{x}=2.68$ ），即受訪警察「不同意」「會打女人的老公才是男人」；其總平均為1.0六七，表示其迷思分數低於2.0及高於「1.0」一點點，較接近不同意。

受訪法官平均迷思分數最高為第1題「夫妻床頭吵床尾和」（ $\bar{x}=1.513$ ），其分數介於「同意」和「不同意」之間；平均分數最低者為第4題（ $\bar{x}=2.05$ ），表其「不同意」「會打女人的老公才是男人」；其總平均分數為0.9五〇五，表示其迷思分數近「不同意」。

受訪檢察官婚暴迷思分析結果發現，其迷思平均分數最高為第6題「只有沒有知識的人才會打老婆」（ $\bar{x}=1.652$ ），介於「同意」與「不同意」之間；迷思分數最低為第11題（ $\bar{x}=1.30$ ），即對「男生和女生都沒有使用暴力的權利」是持「不同意」態度；其總平均分數為1.0八六，表示其迷思分數介於「同意」與「不同意」之間。

社服工作者迷思分數最高為第13題（ $\bar{x}=2.556$ ），表其「不同意」「婚暴原本就存在我們的社會」；其分數最低為第4題（ $\bar{x}=1.11$ ），即其不認為「會打女人的老公才是男人」。其總平均分數為0.5六〇，表示其對婚暴迷思，介於「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之間。

## 五、受暴婦女與各受訪專業人員對婚暴認知

### 比較分析（詳見表六）

就婚暴發生之歸因比較發現，認為是加害人的個人因素，以教育人員（ $\bar{x}=2.257$ ）最高分，次為受暴婦女（ $\bar{x}=2.229$ ），社服人員（ $\bar{x}=2.167$ ），歸因於是受害者因素，則最高為受暴婦女（ $\bar{x}=1.918$ ），次為警察（ $\bar{x}=1.834$ ），其次為教育人員（ $\bar{x}=1.788$ ），歸因為兩性互動關係者最高為教育人員（ $\bar{x}=2.432$ ），受暴婦女（ $\bar{x}=2.348$ ），檢察官（ $\bar{x}=2.304$ ），警察（ $\bar{x}=2.214$ ），法官（ $\bar{x}=2.179$ ），歸因為社會因素，最高亦為受暴婦女（ $\bar{x}=2.038$ ），次為社服人員（ $\bar{x}=1.907$ ）。而就單題分析，受暴婦女、教育人員、法官將婚暴歸因為是加害人有人格偏差導致，次為歸因為兩性溝通問題（詳見表一）。

對有關受暴婦女為什麼不離開受暴關係的看法比較發現，無論是受暴婦女本身或是受訪之執法專業工作者的回答，大部份集中在三個因素，即：（一）「為了孩子」，（二）「經濟不獨立」，（三）「對施虐者還存有希望」；且幾乎大家都一致認為「為了孩子」是受暴婦女為什麼不離開受暴關係的主要原因，只有受訪之醫療系統的醫生是例外，只有一名醫生（三.〇%）作此回答。根據表一的分析，可見醫生的認知和受暴婦女的差距最大，這是否也表示醫生對受暴婦女或對所謂婚暴事件的了解最少，值得進一步探討；反



表六 受訪受暴婦女及各專業人員對婚暴認知比較分析

	受暴婦女	教育	醫療	警察	法官	檢察官	社服人員
總平均	$\bar{X}=1.278$	$\bar{X}=0.885$	$\bar{X}=1.201$	$\bar{X}=1.067$	$\bar{X}=0.9505$	$\bar{X}=1.086$	$\bar{X}=0.506$
婚暴迷思	第一高迷思 婚暴原本不存在 在我們的社會	婚暴原本不存在 在我們的社會	婚暴原本不存在 在我們的社會	婚暴原本不存在 在我們的社會	夫妻床頭吵床 尾和	只有沒有知識 者才會打老婆	婚暴原本不存 在我們的社會
	$\bar{X}=2.0$	$\bar{X}=2.114$	$\bar{X}=2.091$	$\bar{X}=2.052$	$\bar{X}=1.513$	$\bar{X}=1.652$	$\bar{X}=2.556$
	第二高迷思 只有沒有知識 者才會打老婆	夫妻床頭吵床尾 和	夫妻床頭吵床尾 和	夫妻床頭吵床尾 和	婚暴只發生在 少數婦女身上	夫妻床頭吵床尾 和	夫妻吵架只是 社會中的小事
	$\bar{X}=1.778$	$\bar{X}=1.378$	$\bar{X}=1.758$	$\bar{X}=1.929$	$\bar{X}=1.462$	$\bar{X}=1.609$	$\bar{X}=0.667$
	第三高迷思 家醜不可外揚	婚暴只發生在 少數婦女身上	夫妻吵架只是 社會中的小事	只有沒有知識 者才會打老婆	夫妻吵架只是 社會中的小事	小孩雖有個會 打母親的父親 總比沒有好	夫妻床頭吵床尾 和
	$\bar{X}=1.412$	$\bar{X}=1.162$	$\bar{X}=1.576$	$\bar{X}=1.375$	$\bar{X}=1.333$	$\bar{X}=1.478$	$\bar{X}=0.630$
婚暴發生 歸因因素	施暴者	$\bar{X}=2.229$	$\bar{X}=2.257$	$\bar{X}=1.712$	$\bar{X}=1.896$	$\bar{X}=1.988$	$\bar{X}=2.152$
	受害者	$\bar{X}=1.918$	$\bar{X}=1.788$	$\bar{X}=1.591$	$\bar{X}=1.834$	$\bar{X}=1.614$	$\bar{X}=1.674$
	兩性互動	$\bar{X}=2.348$	$\bar{X}=2.432$	$\bar{X}=1.939$	$\bar{X}=2.214$	$\bar{X}=2.179$	$\bar{X}=2.304$
	社會	$\bar{X}=2.038$	$\bar{X}=1.57$	$\bar{X}=1.424$	$\bar{X}=1.40$	$\bar{X}=1.550$	$\bar{X}=1.555$
	最高歸因	施暴者有人格 偏差 $\bar{X}=2.35$	施暴者有人格 偏差 $\bar{X}=2.486$	兩性溝通不良 $\bar{X}=1.939$	受害者沈默助 長施虐行為 $\bar{X}=2.246$	施暴者有人格 偏差 $\bar{X}=2.231$	兩性溝通不良 $\bar{X}=2.304$
	次要	兩性溝通不良 $\bar{X}=2.35$	兩性溝通不良 $\bar{X}=2.432$	施暴者有人格 偏差 $\bar{X}=1.848$	老婆打跑了可 以再娶 $\bar{X}=0.912$	兩性溝通不良 $\bar{X}=2.179$	施暴者有人格 偏差 $\bar{X}=2.261$
受暴婦女不離 開原因 (複選)	第一原因	為了孩子 82.8%	為了孩子 91.9%	經濟不獨立 63.6%	為了孩子 89.5%	為了孩子 97.4%	為了孩子 100%
	第二原因	經濟不獨立 48.3%	對施暴者還存 有希望 56.8%	對施暴者還存 有希望 48.5%	對施暴者還存 有希望 61.4%	經濟不獨立 74.4%	經濟不獨立 59.3%
	第三原因	對施暴者還存 有希望 48.3%	經濟不獨立 40.5%	擔心別人怎麼 想 27.3%	經濟不獨立 40.4%	對施暴者還存 有希望 46.2%	對施暴者還存 有希望 65.2%

(註：0表非常不同意，1表不同意，2表同意，3表非常同意)

表七 比較受訪各專業工作者對婚暴迷思與其性別(男女)兩個團體之間之差異分析(組間比較)(Mann-Whitney U非母群統計)

		迷 思			
受訪者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案數	P 值
教育人員	男	13.00	5.60	13	.1807
	女	20.96	32.04	26	
醫療人員	男	16.71	5.34	31	.0625
	女	7.00	.000	2	
警 察	男	16.82	8.76	38	.7406
	女	13.53	4.93	19	
法 官	男	15.90	9.15	20	.0056**
	女	10.58	4.65	19	
檢 察 官	男	16.50	3.41	16	.0143*
	女	12.29	2.29	7	
社服人員	男	15.25	4.57	4	.0419*
	女	11.34	3.56	23	

(註：分數越高者表示其對婚暴看法越有迷思傾向)

之，法官、檢察官及社服人員的認知與受暴婦女的認知最為接近。

根據前述受訪者之資料比較發現，對婚暴迷思平均分數最高為受暴婦女 ( $\bar{x}=1.278$ )，次為醫生 ( $\bar{x}=1.201$ )，其次為檢察官 ( $\bar{x}=1.086$ )、警察 ( $\bar{x}=1.067$ )、法官 ( $\bar{x}=0.9505$ )、教育人員 ( $\bar{x}=0.885$ )，最低為社服人員 ( $\bar{x}=0.506$ ) (詳見表III)；其中受暴婦女與各專業人員的前三項迷思者如表六。

當以 Mann-Whitney U 非母群統計比較各專業人員之性別是否會影響其對婚暴之迷思，分析結果發現男法官、男檢察官及男社服人員其迷思分數皆顯著高於女性法官 ( $P=0.056$ )、女檢察官 ( $P=0.043$ )、女社服人員 ( $P=0.019$ ) (詳見表IV)；而以迷思平均數比較，迷思平均最高分為女性教育人員 ( $\bar{x}=20.96$ )，次為男警察 ( $\bar{x}=16.28$ )，其次為男醫師 ( $\bar{x}=16.71$ )，最低分者為女醫療人員 ( $\bar{x}=7.00$ )，次為女法官 ( $\bar{x}=10.58$ )，其次為女社服人員 ( $\bar{x}=11.34$ )。

## 伍、討論

自一九九九年六月家庭暴力防治法施行細則執行以來，工作在執行層面出現心有余力不足的問題，即家庭暴力防治雖然進入法治階段，但並不表示足以保障家庭中的被害人，癥結之處乃在於家暴「法」在兩性平權「觀念」之前，其中包括當事被害人與執法的專業工作者對公權力介入家庭的觀念尚未建立等，導致受暴婦女不報案或是拒絕接受公權力的介入，以及執法之警政、司法、醫療與社

服人員執行不力 (彭淑華，一九九九；柯麗評，二〇〇〇；周月清，二〇〇〇)。在本研究中也發現受暴婦女對婚姻暴力認知的迷思分數不亞於受訪之專業人員。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專業人員對婚暴發生有認知上的迷思，尤其是男性專業人員；另，對其他受訪而未寄回問卷者，其迷思可能更高。因此在面對家暴防控工作態度上是否因此欠積極？在面對受暴婦女時，是否不但無法給予接納和情緒上的支持，有時反而對受暴婦女帶來二度傷害呢 (周月清，一九九三；黃志中等，一九九九；丁雁琪，一九九六、二〇〇〇)？甚至忽視家暴法保障婦女的精神呢？缺乏兩性平權或是視婚暴行為為家務事的觀念未能突破情形下，家暴法及其中的保護令仍只停留在形式階段 (柯麗評，二〇〇〇)，是否這也就是受暴婦女的人身安全威脅並未因法的通過而免除之主要原因之一呢？上述這些相關因素皆有待相關性研究進一步釐清。另，專業人員對婚暴認知的迷思，也是受社會價值觀影響 (Straus et al., 1980; Fienne, 1995)，因此一方面對專業人員在工作態度的養成訓練外，改變整體國人對婚暴的重視和建立兩性平權價值觀可能更為重要。

因此提供醫療、警政、司法、教育及社服人員繼續性之教育與訓練，以改變這些防制系統之專業人員對於家庭暴力之處理方式與執法態度，尤其針對婚暴認知迷思的澄清，使其積極於公正受案與辦案，而且能以同理心面對受暴婦女。另外，在文獻中也提及受過

相關訓練的專業人員，其對案例的發現率會提昇(Campbell, 1991)，如此也可增加受暴婦女的求助率。

因此專業人員除了在專業知能的增進外，其在工作態度上的改變也很重要。包括：(一)專業教育的養成，當納入其專業正規教育，包括教育、醫療、警察、司法及社服人員。(二)在職訓練的提供和加強——在研究中發現各專業人員除了社服人員之外，其受過相關訓練的比例極低，因此責成參與婚暴防治工作者必須接受職訓，尤其是針對男性工作者，以及除了社服系統之外的其它系統的專業工作者接受職訓。(三)在本研究中也發現，醫療系統的醫生參與職訓的意願最低(二九%)，次為警察工作者(三九·二%)，而其對婚姻暴力的迷思也高，因此如何鼓勵醫生、警察參與相關職訓，當視為重點工作。

由於本研究對象以立意取樣方式及以台北市為主，因此其代表性未能推論其他縣市或外在效度也受到限制。同時，本研究以郵寄問卷調查法收集資料，加上資料收集對象多元，受訪婦女及專業人員名冊(註一)取得困難外，其參與受訪意願度低，尤其是來自檢法與醫療人員，故無法完全隨機取樣，如警察的名冊無法取得，只好透過台北市警察局代發問卷給受訪警察；醫師名冊也是挨家挨戶到各醫院的服務台拿門診醫師的名冊，故難以完全隨機；受暴婦女要經由社服單位，因此必須有直接接個案及社服單位有社服人員的協助才可進行。回收率除了社服單位達五〇%以上，餘皆在五〇%

以下。因此本研究結果只能作為一種探索型研究發現，未能像一般調查研究作為推論用。而有關受暴婦女方面對各系統需求的探討，也只能針對那些來機構求助者，同時因為受暴婦女的個案必須經由社服機構的協助，因此才取得二八名受訪。

本研究資料收集時間為一九九七年，是在家暴法及其施行細則通過之前，這兩年多來受暴婦女與防制系統之專業人員對婚姻暴力的認知是否有所改變，則有待未來研究探討之。另，Dobash和Dobash (1981)鼓勵從事行動研究，例如促進檢察人員與社區婦女倡導團體有互動和對話機會，作為傳達兩性平權信念與價值觀，從事社會改革，這也是未來國內研究可著力處。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

◎註釋：

註一：感謝高鳳仙法官協助取得檢法人員之名冊。

◎參考書目

丁雁琪一九九六 論受虐婦女救助系統中的二度傷害。婚姻暴力防

治網絡會議 台北市社會局主辦 台北市現代婦女基金會承辦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頁五~十六

丁雁琪二〇〇〇 家庭暴力存活者付出的代價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

委員會 全國婦女人身安全會議特刊 台北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

促進發展基金會承辦 頁二二~二二

王秋崗二〇〇〇 警察與社工員對緊急性暫時保護令聲請作業實況

之初探——以台北市為例 台北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碩士論文

王麗容一九九五 台灣地區婚姻暴力防治策略之研究社會工作模式  
之分析。防治婚姻暴力研究報告 頁九七——一七九 內政部社  
會司委託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林淑娥二〇〇〇 誰的最佳利益：母親或兒童？——初探台北市婚姻  
暴力合併兒少虐待家庭的社工處遇 台北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應用社會學組碩士論文

周月清一九九三 台灣受虐婦女社會支持探討之研究。婦女與兩性  
學刊 五 頁六九——一〇八；二〇〇〇 家庭暴力防治「法」與  
執行落差之探討——各縣市家暴中心防治工作問題與改善 社區  
發展 九二期 頁二八六——三〇一

周月清、高鳳仙一九九七 台北市婚姻暴力防治體系之研究——現況  
及需求之評估 台北市府專題委託研究計劃成果報告

柯麗評二〇〇〇 保護令真的保護了遭受到虐待的婦女嗎？律師雜  
誌 二四八 頁五八——七一

高鳳仙一九九六 a 論我國婚姻暴力法 萬國法律雙月刊 八六 頁  
三——十三；一九九六 b 家庭暴力法規之保護令研究（上） 司  
法週刊 第七八〇期 第三版 民八五年六月十九日；一九九六  
c 家庭暴力法規之保護令研究（下） 司法週刊 第七八一期

第三版 民八五年六月二六日 一九九六 d 論國外家庭暴力委  
員會之組織與功能 司法週刊 第七九〇期 第二版 民八五年  
八月二八日；一九九八 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導論 台北 五南  
出版

張尙文一九九六 衛生部門對婚姻暴力防治的現況與展望 婚姻暴力  
防治網絡會議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九日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暨  
台北市現代婦女基金會主辦 頁五五——六九

彭淑華一九九六 台灣受虐婦女專業整合服務之研究 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湯琇雅一九九三 婚姻暴力中婦女受虐狀況與其因應過程之初探  
私立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志中一九九八 受虐婦女的求醫經驗 醫療雜誌 二五 頁三三——三  
五

黃志中、吳慈恩、張育華、李詩詠一九九九 婚姻暴力受虐婦女的醫  
療經驗經驗 第五屆社會工作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 中華心

理衛生協會 頁一——十四

黃志中、吳慈恩一九九八 從醫療資源之使用探討現階段婚姻暴力  
處置之工作模式 第四屆社會工作實務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 中  
華心理衛生協會 頁五——十一

黃志中、高浩雲、張淑娟一九九八 某綜合醫院五十位受虐婦女的

醫療經驗 中華家醫誌 八 頁八一～八七

黃富源、葉麗娟 一九九六 我國警察人員回應婚姻暴力之研究。婚姻暴力防治網絡會議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暨台北市現代婦女基金會主辦 頁二三～四五

黃富源、許福生 一九九五 警察系統回應婚姻暴力的理論與實務 防治婦女婚姻暴力研究報告 內政部社會司委託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頁四～三九

陳如鸞 一九九五 醫療領域 防治婦女婚姻暴力研究報告 內政部社會司委託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陳若璋 一九八八 a 臺灣婚姻暴力狀況與治療策略研究 台大人口研究中心婦女研究室；一九八八 b 婚姻暴力引發因素及被毆打婦女的研究 婦女研究暑期研習會論文集 頁一〇三～一一二；一九九二 a 臺灣婚姻暴力高危險因子之探討 台大社會學刊 二十一：一九九二 b 臺灣婚姻暴力之本質、歷程與影響 兩性學刊 三 頁一一七～一四七；一九九五 台灣處理婚姻暴力體制之改革方案 防治婦女婚姻暴力研究報告 內政部社會司委託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頁六九～九六

陳質采 一九九五 精神醫療領域 (二) 防治婦女婚姻暴力研究報告 內政部社會司委託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頁六十一～六十八

蔡元祿 一九九五 精神醫療領域 (一) 防治婦女婚姻暴力研究報告

內政部社會司委託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頁五〇～六〇  
魏英珠 一九九五 台北市政府北區婦女福利服務中心之受虐婦女團體方案為例 台北 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Black, D. (1980).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oli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Bograd, M. (1988).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wife abuse: An introduction. In K. Yllo & M. Bograd (Eds.),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Wife Abuse* (pp. 11-26). Newbury Park, CA: Sage.

Bourg, S., & Stock, H.V. (1994). A review of domestic violence arrest statistics in a police department using a pro-arrest policy: Are Pro-arrest policies enough? *Journal of Violence*, 9(2), 177-189.

Bowker, L. H. (1982). Police services to battered women.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9(4), 476-94.

Buzawa, E. S., & Austin, T. (1993). Determining police response to domestic violence victim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6(5), 610-623.

Buzawa, E. S., & Buzawa, C. G. (1996). *Domestic violence: The criminal justice response* (2nd). Thousand Oaks: Sage.



- Campbell, J. C. (1991). A review of nursing research on battering. In C.M. Sampselle (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Nursing research, education and practice issues* (pp. 69-81). New York: Hemisphere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Cooper, N., & Pennington, D. (1995). The attitudes of social workers, health visitors and school nurses to parental involvement in child protection case conferenc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5(5), 599-613.
- Dobash, R. E., & Dobash, R. P. (1978). *Wives: The "appropriate" victims of marital violence*. *Victimolog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 426-442.
- Dobash, R. E., & Dobash, R. (1979). *Violence against wives*. New York: Free Press.
- Dobash, R. E., Dobash, R. P. (1992). *Women, violence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 Dobash, R. E., & Dobash, R. P. (1981).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action: The case of wife beating.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4), 439-470.
- Dobash, R. E., & Dobash, R. P. (1981). Community response to violence against wives: Charivari, abstract justice and patriarchy. *Social Problems*, 28, 563-581.
- Dobash, R. P., Dobash, R. E., Wilson, M., & Daly, M. (1992). The myth of sexual symmetry in marital violence. *Social Problems*, 39(1), 71-91.
- Dull, R. T., & Wint, A. V. N. (1997). Criminal victimization and its effect on fear of crime and justice attitude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12(5), 748-758.
- Dutton, D. G. (1988). *The Domestic Assault of Women: Psychological and Criminal Justice perspective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Inc.
- Dutton, M. A. (1992). Empowering and healing the battered woman: A model for assessment & intervention.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 Dyehoues, J. M. (1991). Abuse of women in the health care system. In C.M. Sampselle (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Nursing research, education and practice issues* (pp. 219-234). New York: Hemisphere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Edleson, J.L.(1991). Coordinated Community Responses. In M. Steinman (Ed.) *Woman battering : Policy responses* ( pp. 203-219 ).Cincinnati, OH : Anderson Press.
- Edleson, J.L., & Tolman, R. M.(1992). Intervention for men who batter: An ecological approach. Newbury Park: Sage.
- Ferraro, K. (1989). Policing women battering. *Social Problem*, 36(1), 61-74.

- Fiene, J. I. (1995). Battered women: Keeping the secret. *Affilia*, 10(2), 179-193.
- Ganache, D.J., Edleson, J.L., & Schock, M.D.(1988). Coordinated Police, Judicial, and Social service response to Woman Battering : A multiple-baseline evaluation across three communities. In G.T.Hotelling, D.Finkelhor, J.T.Kirkpatrick, and M.A.Straus (Eds.), *Coping with Family Violence : research and policy perspectives*. CA : Sage Publications, Inc.
- Gelles, R. J. (1999). Family violence. In R. L. Hampton (Ed.), *Family violenc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2nd ed.) (pp.1-32). Thousand Oaks, CA: Sage.
- Gelles, R.J., & Straus, M. A. (1988). *Intimate Violence*. New York : Simon and Schuster.
- Gelles, R. J. (1993). Constraints against family violence: How well do they work?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6(5), 575-586.
- Gelles, R. J. (1993). Through a sociological Lens: Social structure and family violence. In R. J. Gelles & D. R. Loseke (Eds.), *Current controversies on family violence* (pp. 31-46). Newbury Park, CA: Sage.
- Giuliani, R. W., & Bratton, W. J. (1994). *Policy Strategy No. 4: Breaking the cycle of domestic violence*. New York: Police City of New York.
- Gordon, J. S. (1998). Helping survivors of domestic viole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medical, mental health, and community service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 Hampton, R. L., Jenkins, P., & Vandergrieff-Avery, M. (1999) Physical and sexual violence in marriage. In R. L. Hampton (Ed.), *Family violenc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2nd ed.) (pp.168-197). Thousand Oaks, CA: Sage.
- Hester, M., Pearson, C., & Harwin, N. (2000). Making an impact: Children and domestic violence: A reader. London: 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 Home, A. M. (1994). Attributing responsibility and assessing gravity in wife abuse situa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ce and social workers.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19(1/2), 67-84.
- Klingbeil, K. S., & Boyd, V. D. (1984). Emergency room intervention: Detection,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In A. R. Roberts (Ed.), *Battered women and their families: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nd treatment programs*(pp. 7-32). New York: Springer.
- Lavoie, F., Jacob, M., Hardy, J., & Martin, G. (1989). Police attitudes in assigning responsibility for wife abuse.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4(4), 369-388.

- Ledray, L. E. (1994). The role of the sexual assault nurse clinician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Chinese and American Experiences. 16-19, November, 1994,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eneman, L. (1997). "A tyrant and tormentor. : Violence against wives in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Scotland. Continuity and Change, 12(1), 31-54.
- McCord, J. (1992). Deterrence of domestic violence: A critical view of research.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29(2), 229-239.
- Perley, M. J. (1991). Health care agency support for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C.M. Sampselle (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Nursing research, education and practice issues* (pp. 235-246). New York: Hemisphere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Sampsell, C. M., Bernhard, L., Kerr, R. B., Opie, N., Perley, M. J., & Pitzer, M. (1991). Violence against women: The scop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problem. In C.M. Sampselle (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Nursing research, education and practice issues* (pp. 3-16). New York: Hemisphere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Scherman, L. W., & Berk, R. A. (1984). The specific deterrent effects of arrest for domestic assaul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261-272.
- Schmidt, J.D., & Sherman, L.W. (1993). Does arrest deter domestic violenc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6(5), 601-609.
- Sherman, L. W., & Berk, R. A. (1984). The specific deterrent effects of arrest for domestic assaul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261-272.
- Trute, B., Adkins, E., & MacDonald, G. (1992). Professional attitudes regarding the sexual abuse of children: Comparing police, child welfare and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Child Abuse & Neglect*, 16(3), 359-368.
- Walker, L. (1993). The battered woman syndrome is a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 of abuse. In R. J. Gelles & D. Loseke (Eds.), *Current controversies on family violence* (pp. 133-153). Newbury Park, CA: Sage.